汉语古典诗歌意象重构的过程及其创造心理机制

刘冠雄 周治金 刘威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汉语古典诗歌的阅读欣赏过程是读者审美再创造的心理过程。其创造性加工的对象是诗人“融情于景”所创构的艺术意象，具有认知象喻性、情感负载性和情景交融性 3 个心理加工特征。其创造性加工的结果是生成“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此产物既具有客观的感知觉表征特点，又蕴含读者主观感悟到的思想与情感等内涵。读者将艺术意象重构为审美意象的过程是古诗阅读欣赏的核心创造过程，其心理机制涉及到读者长时记忆系统中信息的激活与选择性整合。具体而言，读者在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的支持下，通过语义联想和表象建构激发了相应情绪情感并理解意象负载的情绪意义，产生了主观情感体验（情感元素）并生成了关于诗歌语篇的心理模型（认知元素）。在此基础上，读者在审美观照（目标动机）下将相关认知元素和情感元素与其自传体记忆中的自我相关图式进行选择性整合，由此建立新颖的联系，产生新想法与新观念。如此便完成以文本为中心的意象阅读理解，到以读者为中心的意象心理重构的审美再创造过程。读者在该过程中生成了审美意象，也使其自我图式发生更新。这一过程主要受到古诗艺术意象新颖程度和读者自身的创造性想象能力的约束。这项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呼吁国内创造力研究者重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创造心理过程，关注包含情感加工的热认知过程。

关键词：意象，重构，长时记忆系统，情景交融

1 引言

诗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流行最广的文学样式。汉语古典诗歌（后称**古诗**）的特点是以少总多，具有含蓄、多义的特点，通常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细腻的情感。在西文，其最原始的含义可以追溯至希腊语中的 ***poiesis***，意为制作和**创造**。朱光潜(2012)指出，不管是诗歌创作还是欣赏都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关于这种创造性过程，他认为：“对于作者来说，创造就是把由意象构成的融入了诗人情趣的意境用语言文字表现出来；而对于读者来说，创造就是通过语言文字调动自己的情感经历把诗所表现的意境领会出来，因为每个读者的情感经历甚至于同一读者于不同时期时的情感经历都是不同的，所以欣赏一首诗也就是一次无可复现的创造”。

诗歌创作作为典型的艺术领域的创造活动，其心理机制与神经基础在创造力研究领域已有研究者涉足(S. Liu et al., 2015; Chen et al., 2020; He et al., 2022)。但诗歌阅读欣赏过程作为诗歌创作的逆过程(Tinio, 2013)，探讨读者对诗歌进行审美再创造过程及其创造心理机制的研究却寥寥无几。目前国内针对诗歌，特别是古诗的认知心理学研究绝大多数都从语言心理

学的取向展开，包括对古诗节奏、韵律特征的加工(Teng et al., 2020; 李卫君 & 杨玉芳, 2010, 2016)以及古诗中节奏、韵律和语义加工的相互作用特点(Chen et al., 2016; 陈庆荣 & 杨亦鸣, 2017)。这些研究探讨的是知觉和语义理解过程，而非诗歌欣赏或创造性思维过程。与之相比，国内的张晶、刘昌等人针对五言古诗中由诗眼诱发的顿悟展开了系列研究，他们认为读者对诗眼的加工是诗句鉴赏中的典型顿悟过程，这是一个通过意象重组，将诗句的原有表征整合并更新为一个全新的表征的过程(张晶 等, 2015; 张晶 & 刘昌, 2021)。基于此，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欣赏古诗时通过“悟”的方式来直觉式地把握古诗深层意蕴，并伴随着强烈的审美体验(张晶 & 陈燕, 2017)。张晶、刘昌等人率先将古诗阅读欣赏过程与“顿悟”研究方法起来，但这种“顿悟”因诱发而起，难以解释读者欣赏古诗时自发产生的感悟现象。

我国古代诗人本着“语贵含蓄”的主张，以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为主要创作手段，创作出内涵了丰富意蕴的诗歌。这使得读者在欣赏古诗时，就需要“披文入情”，通过还原古诗所描绘的情景，激发读者的主观情感体验，进而感悟古诗的情感意蕴。因此，我们在深入考察古诗阅读欣赏的过程及其创造心理机制这一重要理论问题的时候，必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下，采取跨学科视角，将心理学理论和中国古代诗论中的重要思想结合在一起分析。中国古代诗论历来重视**意象**这一核心范畴，其作为诗歌艺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陈植锷, 1990)，具有**情景交融**的审美结构(叶朗, 2009)。所以，本文将从意象开始，逐步深入分析读者阅读欣赏古诗的过程及其创造心理机制。

2 意象及其特征

2.1 意象的概念

意象的含义最早可追溯至《易传·系辞》中的提出的哲学观点，指用来表达某种意义的形象。古人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圣人“立象以尽意”。先秦时期诸子都在其成书中表达了类似的哲学思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假象见意”的哲学主张由经学家王弼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得意忘言”以及“得意忘象”的理论主张，认为对“象”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表面，要去追寻“象”背后深刻的“意”。刘勰将这种哲学思想结合文艺创作的理念，首次从理论上确定了意象在诗学上的地位。在《文心雕龙·神思》中，他指出诗人在进行创作时需要“窥意象而运斤”，在《文心雕龙·物色》中通过“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阐述了意象与自然景物和诗人情感之间的关系及其生成方式，并在《文心雕龙·隐秀》中说明使用意象表达言外之意所达到的“义生文外，秘想旁通，伏彩潜发”的艺术效果(王运熙 & 周锋, 2012)。

简言之，意象是诗歌等文学作品中表达作者主观情志的典型物象，其中“意”是指作者的思想情感，“象”则是指外在的具体景物，两者相互交融成为寄寓了作者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屈光(2002)梳理了古诗意象概念发展的历史，而后对意象进行界定：指**诗人以独特的审美表现创造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艺术形象**。这一定义表明：一方面，意象的本质在于寄托隐含、委婉含蓄，因而具有双重意义；另一方面，意象的艺术性体现在“象”和“意”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即“情景交融”的内在审美结构。

意象根据其存在形态来区分，可分为单象意象、多象意象和意象组合。本文如没有特别说明，“意象”指的均是至少以诗句为单元的，由多个单象意象组合而成的完整情景，即意象组合，其特点是每个单象意象可能有其自身的双重意义，其组合而成的整体意象也寄托了诗人的某种言外之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意象不是心理学的概念“表象”，表象在认知心理里指类似于知觉的心理表征，而意象概念较为复杂，它可以简单理解为融入作者或读者的思想情感的表象表征。

2.2 古诗意象的特征

意象既是作者创作古诗时的产物，也是读者阅读欣赏古诗时的主要心理加工对象之一。参考有关诗学理论，我们认为意象具有**认知象喻性**、**情感负载性**和**情景交融性** 3 个主要特征。

所谓认知象喻性，是指意象具有双重意义，即表层义与深层义。意象的表层义是指其对应的物象的含义，例如，“月”、“蝉”、“梅花”等本身含义。意象的深层意义，是指作者投射到物象上的思想感情。例如，“月”意象的深层义可以是“相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以是“离愁”（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等等。因此，读者对意象的认知加工会基于表象进行，并且加工的结果是通达意象背后隐含的情绪意义。白居易在《金针诗格》中将意象的深层意义称为诗歌的内意，包括“美（赞美）、刺（讽刺）、箴（规劝）、诲（教诲）之类”，也就是诗人想传达的某种情绪信息，袁行霈(2009)称之为情韵义。总之，古诗意象类似于比喻性语言，单象意象类似于比喻词汇。贾丹丹(2021)的实验研究发现意象意象的深层含义通达在无语境时遵循两阶段模型，在有语境时遵循直通模型。

所谓情感负载性，是指意象承载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屈光(2002)认为诗人创造的意象具有情感、心理和生活的真实性。正是这种真实性，能够让读者在欣赏古诗时遵循相应的情感逻辑还原诗人的情感体验，建立与诗人的情感共鸣。有研究表明，诗歌能以独特的方式诱发读者的生理唤醒和情感体验(Wassiliwizky et al., 2017)，并且这种情绪情感的激发可能和读者阅读欣赏时的心理模拟有关(Johnson-Laird & Oatley, 2022)。贾丹丹(2021)对单象意象（词）、情绪词和中性词的比较研究发现，单象意象和情感负载词类似，具有相似的情绪负载功能和情绪效应。

所谓情景交融性，则是中国古代诗论中对意象之审美结构特征的描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曾这样论述古诗中的情、景关系：“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里是说古人讨论诗词，总是将诗歌的景和情分开讨论，但实则两者相融，无法分开。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中国古代诗论中关于情景交融的说法，除了暗示意象中“意”和“象”的内在关联，也内涵了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和审美对象互相作用、交融统一的反二元论思想，体现了一种**动态、建构以及整合**的心理加工方式。具体来说，意象创构手法可分为“触景生情，情由景发”、“借景抒情，情赖景显”、“双向互动、情景融合”三种，均反映了作者创构意象时的知情整合加工的特点。读者阅读欣赏古诗的过程则是对诗人所创构的意象进行再加工与再创造，生成审美意象的过程，也遵循诗人创构艺术意象时的知情整合式的心理加工。

2.3 审美意象

读者阅读欣赏古诗的最高层次目标是对意象进行心理表征重构，进而生成有意义、情趣的审美意象。**审美意象**这一概念由朱光潜所创造，将其用于翻译康德、黑格尔等著作中的*Aesthetic Image*一词，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象理论与西方美学思想结合起来。其后，叶朗在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意象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在意象”的观点，确认了审美意象既不是完全外在的实体，也并非纯粹主观的体验，是在审美活动中所生成的、一种融合了主客体表征的感性形态(叶朗, 2009)。在当代，朱志荣进一步发展了相关理论，主张“美是意象”，认为审美意象就是美的本体，是审美主体以其能动性和创造力主动创构出的感性对象，审美活动就是审美意象的创构活动(朱志荣, 2014, 2016)。

古诗艺术意象是读者审美再创造的对象，而审美意象则是读者审美再创造的结果。两者都具有“情景交融”这一意象的本质特征，艺术意象反映的是诗人进行审美创作时的主客体统一，审美意象则反映的是读者进行审美再创造时的主客体相融。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方面，艺术意象是古诗文本中现成的，而审美意象是读者在阅读欣赏过程中建构和生成的；另一方面，艺术意象有文字符号作为其呈现载体，而审美意象是存在于读者精神世界的感性形态。换言之，**审美意象是读者在阅读欣赏古诗过程中对艺术意象进行创造性加工后生成的产物，既具有客观的感知觉表征特点，又蕴含读者主观感悟到的思想、情感等内涵。**

总之，诗人创作古诗时往往以“言志抒情”为其根本旨归，其创作手段主要是托物言志和借景抒情，即通过意象来表达其思想感情。古诗阅读欣赏大体上是古诗创作的逆过程，读者主要的心理加工对象就是古诗中的艺术意象，其创造性加工结果是生成了审美意象。读者建构古诗审美意象的心理过程是下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3 古诗阅读欣赏与记忆的关系

从中国古代诗论的观点出发，诗人“触景生情”的意象创构方式大致包括“**感物**”、“**起情**”和“**情景交融**”三个主要阶段。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读者阅读欣赏的过程是从对古诗文本中的意象加工开始，直到生成审美意象作为结束，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心理加工阶段，分别是**对意象的认知加工**、**情感激发与情感体验**，以及**知情整合**（即意象重构）。在这个过程中，古诗文本的信息会与读者长时记忆中的信息相互作用、逐步融合，完成从以文本为中心的阅读理解到以读者中心的审美感悟的转变。如图1所示，我们通过理论分析建构了古诗阅读欣赏的心理加工模型，其中包含了古诗意象重构的心理过程及其创造心理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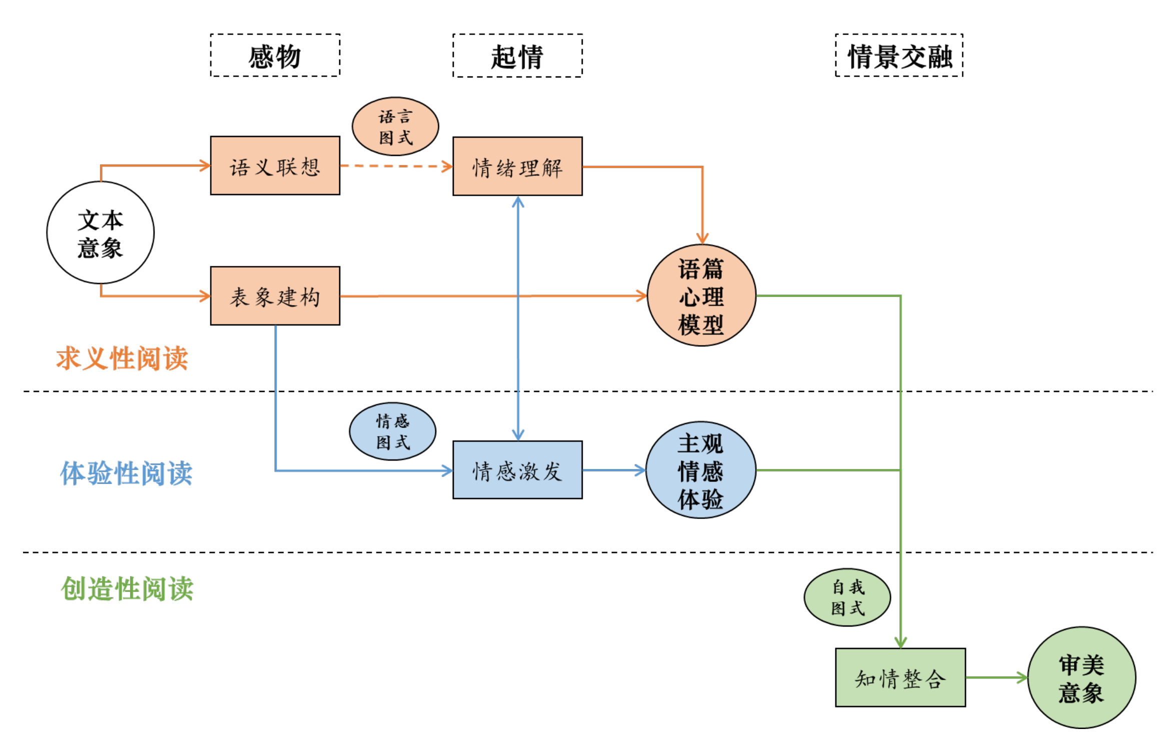


图 1 古诗阅读欣赏的心理加工模型

3.1 古诗阅读欣赏中认知、情感加工与长时记忆的关系

由于古诗阅读欣赏的过程需要调用长时记忆中有关信息，并与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进行选择性整合。所以，下文先描述与古诗语义信息加工有关的语义记忆和语言图式，与情绪情感加工有关的情景记忆和情感图式，其后分析读者对意象的认知加工与情感加工过程。

一般来说，读者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心理过程，本质上是**个体将外界输入的刺激**（例如古诗文本）**信息与内部长时记忆**（这里只讨论陈述性记忆）**中已有的信息进行比较与整合，然后更新自身长时记忆表征的过程**。我们知道，长时记忆根据信息储存和表征形式的不同分为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和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语义记忆一般以概念或命题的形式储存，反映了个体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各概念之间的联系(Kumar, 2021)；情景记忆则以知觉表象或情景模型的形式储存，反映了个体在某一具体的时空背景下对多模态事件经历的表征(Tulving, 2002)。个体的阅读、学习与生活事件经历会使其长时记忆中存在一些现成的信息结构，我们借用“**图式(Schema)**”这一术语来描述读者在古诗阅读欣赏过程中可能调用的相关信息结构。用“语言图式”描述与阅读理解相关的概念、命题等长时记忆信息表征，例如对于“梅花”这一古诗中常见的意象，读者语义网络中可能便储存了与之相关的情感含义“梅花-高尚”这样的语言图式；用“情感图式”描述与情绪理解、情感体验相关的情景记忆信息表征。例如“折柳”、“长亭送别”与“远行”、“赴任”、“出征”等情景，与之相关的情感图式可能是“不舍”、“离愁”及其相关主观情感体验。

记忆领域的神经研究表明，当个体从外界接收到新信息时，会将其与长时记忆中的已有知识(Prior Knowledge)进行积极整合(Hasson et al., 2015; Yeshurun et al., 2021)；并且长时记忆中的信息会改变并塑造个体对原始信息的神经表征(Bein et al., 2020; Hasson et al., 2015)，表现出记忆表征的转换性(Transformation)(Sheng et al., 2023; Xue, 2018, 2022)，而正是这种外部

刺激与长时记忆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个体对所输入信息的有效记忆与有意义联想(Z. Liu et al., 2017; Xue, 2018)。所以，有理由假定，当古诗文本中的意象以听觉语言或视觉文本的形式呈现时，读者会激活自身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中的相关信息，其中那些与古诗内容相关的心理图式随着时间累积而慢慢突显出来。随后，外界的刺激与内部的信息开始选择性整合，新的信息结构同化至读者被激活的心理图式，与之对应的长时记忆表征也随之更新。

具体而言，当读者完成对文本初步的语义理解之后，会接着进行语义联想和表象建构等认知过程。语义联想激活了读者语义记忆中的某种语义联系，这种语言图式支持读者进一步理解作者借助意象表达的情感意义。但纯粹的语义联想可能难以帮助读者准确识别作者通过特定的情景所表达的复杂情感意义，所以有经验的读者往往还会进行表象的加工。表象建构则会激活读者的情景记忆，其中的感知运动细节会帮助读者建构生动、鲜明的情景模型，并根据相关的情感图式激发相应的情感体验，开始伴随着情绪情感加工。这种情感图式一般是个体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有关情感体验的记忆。

读者通过语义联想和表象建构，建构了关于古诗文本的连贯心理表征，生成了一个用于解释“作者想表达什么”的**语篇心理模型**，其中包含了“作者借助 xx 意象表达了 xx 的情绪意义”一类的命题性语义表征，也包含了古诗所描绘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景物以及事件的多模态信息表征。至此读者完成了求义性阅读。读者通过建构情景，并在想象的情景中进行替代性体验（心理模拟）的方式，产生了与特定情景相关的生理唤醒和**主观情感体验**，并且与诗人或文本产生了情感共鸣。那么读者则完成了体验性阅读。读者对古诗的求义性阅读与体验性阅读都带有创新学习的性质，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此略过。

3.2 古诗意象重构与自传体记忆的关系

古诗阅读欣赏的认知加工与情感加工是知情整合加工的基础，读者在审美观照下，不仅需要统合前两阶段输出，也要调用**与自我相关的长时记忆信息**，进一步领悟古诗的意象的内义或深层义，感悟古诗情感、情趣或韵味，将读者主观的自我感受投射到古诗意象上，从而对古诗意象完成心理表征重构，即生成了审美意象。

上述观点提出，基于以下记忆相关理论和研究证据。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个体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和记录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和解释经验(Wittrock, 1992)。而意义建构的主要方式正是个体试图将自我元素与外部世界的元素建立联系(Heine et al., 2006)，即意义是个体在理解自我及其与环境关系基础上主观构建的(赵娜 等, 2017)。近期有研究者提出了创造性观点产生的记忆理论框架(MemiC, Memory in Creative ideation)，认为和创造性观点的产生有关的心理要素与个体的记忆认知过程密不可分，例如长时记忆中的信息搜索、对有用信息的组合与建构，以及基于长时记忆的信息评估与选择等(Benedek et al., 2023)。并有大量研究关注并考察了个体的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如何影响个体的创造性表现(Kenett & Faust, 2019; Ovando-Tellez, Benedek, et al., 2022; Ovando-Tellez, Kenett, et al., 2022; Madore et al., 2015; Thakral et al., 2020)，但少有研究关注个体的自我相关记忆如何支持创造性观点产生。

在审美领域，有研究证实了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在审美欣赏中的重要

作用。在视觉艺术领域，研究表明个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偏好不仅仅取决于刺激的物理特征，也取决于读者评定的自我相关性(Vessel et al., 2023)。音乐领域的研究也发现，人们对青少年和成年早期的音乐有更明显的偏好，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这一时期是青少年建立身份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时段(Holbrook & Schindler, 1989; Loveday et al., 2020)。此外，Hetherington 和 Atherton(2017)从理论上解释了读者在阅读散文诗时产生“审美移情(aesthetic empathy)”的原因，他们认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会进入一种接近“白日梦”的状态，这种状态会激活一系列的自传体记忆，在这些记忆的支持下，读者参与建构了诗人借由诗歌所重演的记忆，并体验了与这些记忆相关的情感反应。

根据自我记忆系统(SMS, Self-Memory System)模型，自传体记忆被描述为由个体长时记忆中关于自我的概念知识和相关情景记忆建构而成的心理表征，可分为工作自我(work-self)、情景记忆和长时自我(long-term self)三个不同的子成分(Conway et al., 2004, 2019; Conway & Pleydell-Pearce, 2000)。其中工作自我是指由一系列复杂目标驱动的控制过程所构成的短暂心理结构，通常由外界刺激线索所诱发；情景记忆则是储存了那些和自我相关事件中的感知觉运动信息，通常采用多模态（例如视觉表象）的形式来表征；长时自我则是和自我知识库和自我概念的集合，前者是个人生活故事的梗概，而后者则包含了一个人对自我以及外部世界的认识、态度与价值观念(Conway et al., 2004)。根据该模型，在个体建构自传体记忆的过程中，在目标(Goals)的引导下，会有一系列认知、情感元素和长时自我中的信息发生整合，并因此相互融合形成完整的心理表征(Conway et al., 2004)。

前文已述，在古诗阅读欣赏的过程中，读者会自发激活其长时记忆中的语言图式和情感图式来支持其完成求义性阅读和体验性阅读。同样地，与这些心理图式相关的自传体记忆中的信息也会在相应线索的作用下被激活。这些信息就是 SMS 模型中的工作自我，在本文中称之为自我图式。自我图式中既包括关于自我认识的命题性结构，也包括自我参与事件中的多模态信息，但其核心是由自我概念中关于自我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念这类更抽象的信息，可能来源于个体特殊的人生事件经历，也可能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关。

我们认为，**古诗意象重构的过程需要读者在文本与自我之间建立联系，其中关键的创造心理机制是将读者阅读欣赏过程前两个阶段产生的认知元素和情感元素与自我图式进行选择性整合**。换言之，读者不再简单以表象表征古诗所描述的情景，也不限于理解古诗艺术意象中所寄托的诗人的思想感情，而是进一步将古诗语篇的心理模型与自身的主观情感体验与其长时记忆中的自我图式相整合，建立新颖的信息联系，并由此产生了新想法和新观念。在该过程中，阅读欣赏行为发生从以文本为中心阅读理解到以读者为中心的审美感悟的转变，景、情相互融合，知、情进行整合，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建立联系。读者对古诗意象的心理加工染上了自我的“色彩”，使其心理表征发生重构，生成审美意象；也使读者长时记忆中自我图式发生更新。

下面举例说明意象重构时读者自我图式的激活与更新。

在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

出阳关无故人。）中，前两句“轻尘”和“客舍”暗示了旅行的目的为送别，“朝雨”和“柳色”两个意象点明了送别的时间，后两句“劝酒”和“阳关”等意象则写明了作者送别时的行为与送别时的环境(俞平伯, 2013)。读者在阅读欣赏这首诗歌时，会激活相关语言图式，如“柳”的谐音为“留”，由此建立“柳树-挽留-不舍”这样的语义联系；会激活相关情感图式，如由“西出阳关”的荒凉而生的悲伤，与“友人分别”相关的遗憾，与“把酒言欢”相关的劝慰等。读者通过语义加工建构了关于诗人在何时、何地、何种环境、以何种方式送别友人这一事件的命题性文本表征，通过表象加工建构了一幅“春雨之后，客栈周围的柳树挂着露珠，散发着盎然春意，诗人和友人在湿泞的路边相别”的画面。以上两者共同构成了读者关于古诗语篇的心理模型，与在此过程中读者产生的悲伤、遗憾和劝慰等主观情感体验一起，作为线索激活了读者与之相关的自我图式。这些自我图式中可能包含了读者作为“友人送别”这一事件的参与者所秉持的情感、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念。当这些信息与古诗欣赏过程中的认知元素和情感元素进行选择性整合的时候，诗人与友人的那种深厚情谊很可能会感染到读者，读者也将自我投射到文本中，产生诸如“聚散皆是人生常态”或“分别是命，相见是缘”这种新观念，其自我图式也发生更新。

4 想象与古诗意象的重构

前文已述，古诗阅读欣赏的核心创造过程是读者基于长时记忆，特别是自传体记忆重构古诗意象的过程。所以，读者的阅读经验、生活阅历对重构的古诗审美意象的创新程度影响很大，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可能来自于**古诗艺术意象本身的新颖程度**（诗人留下的创造性想象空间），以及**读者的审美想象力**（读者自身的创造性想象能力）。

仍以王维的送别诗为例来加以说明。在《送元二使安西》中，首联两句写“乐”景（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以此反衬送别时的离愁，使“愁”倍增。但是，尾联情感过于直露，留给读者下的想象空间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读者重构意象的新颖性。在《送沈子归江东》（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中，尾联也似直抒胸臆，好在采用了新颖比喻，以春色比喻诗人相思，以小舟载沈子缓归时江南江北草色渐绿，代表诗人一直相送友人归家。

读者阅读欣赏第二首诗的后两句时，需要基于想象，理解或领悟新颖比喻之妙，即以“春色”比拟人相思的心理活动。也需要读者动员想象进行心理旅行，想象自己的相思如春色，一路相送，进而感受诗人送沈子的一片深情。因唐代与当今在交通、通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阅读经验较丰富的读者在涵泳品味古诗时，其生动、鲜明的情景想象既可以激活其自传体记忆相关信息，促进意象重构，也能更新其自传体记忆。

王维的另一首诗《山中送别》（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就更大。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思考（想象）为何日暮才掩柴扉，是诗人送友人甚远、日暮方回，还是送别友人后，依然恋恋不舍、心中还存有一份友人折返的期盼，直到日暮……接下来，读者需要追随作者的思绪，飞到明年春天，期盼友人回来，但不知友人是归还是不归？一会儿想象友人归返时相见的欢乐情景……一会儿想象友人不归、而令人

惆怅的情景

总之，读者阅读欣赏古诗、重构古诗意象过程中，既需要调用长时记忆中的有关信息，更需要将自己置身于诗境之中，想象自己就是诗人，像诗人一样有一位好友与自己一起半隐于山中，谈古论今、琴棋相娱、诗文相酬……但是有一天，好友奉诏返朝或下山游历，自己在山中送别友人的所为、所感、所盼等。读者阅读欣赏古诗时，其动员的心理模拟（送别、掩）、心理旅行（来年春天、翘首相盼）、移情想象（我即诗人）与共情等审美想象力越强，那么其所能激发的主观情感与自我图式也就越丰富，其生成的审美意象中的情景就越水乳交融，越具有创造性。

王维极受专家称道的《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一诗更是词浅情深。其最后两句不惟以写景来表情说理，更在于从中表现出心灵的体悟。例如，“白云无尽”除了表现诗人的无限情思外，似乎还含有一种穷尽世理，领悟超妙的禅意。读者阅读欣赏此类“含蓄无垠”古诗，既需要调用其长时记忆中的丰富的生活经历、人生态度等，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与感悟能力，来感悟诗歌言外之意，味外之旨。感悟此类“余味无穷”古诗的过程，本文暂不讨论。

5 小结与展望

本文结合中国古代诗论和传统美学理论，认为读者阅读欣赏古诗的主要心理加工对象是古诗中的艺术意象，并探讨了与古代诗论中所提出和“感物”、“起情”和“情景交融”相对应的认知加工、情感加工与意象重构三个主要的心理加工过程。并结合相关心理学理论与实证研究，详细分析了读者重构古诗意象的过程、其创造心理机制与约束条件。

Vartanian(2014)指出，虽然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一体两面，但其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分开进行的，关于艺术创作过程的理论和研究证据难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艺术欣赏过程，反之亦然。本文首次从创造心理的视角切入，关注了读者阅读欣赏古诗中的意象重构（即艺术欣赏中的审美再创造）这一特殊的创造过程。

我们认为，在对文学艺术欣赏的心理学研究中，对其语义、情绪信息的创造性认知加工易受关注；但是，感悟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情感、产生情感共鸣，统合知情成分、生成审美意象，这些更易受社会文化影响、也更能代表文学艺术欣赏中的审美再创造过程，研究者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这项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初步提供了古诗意象重构的过程及其创造心理机制的解释框架，尝试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创造过程和包含情感加工的热认知创造过程的研究打开新思路。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本文在此提出三点研究展望：

其一，从实证研究的方法上，想要研究古诗阅读欣赏这类难以通过行为测量、个体间差异较大的心理过程并非易事。借助 EEG 以及 fMRI 等神经技术来对感兴趣的目标过程进行探测是可靠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必须根据相关技术的时空分辨率特点来设计实验范式，将对目标心理过程的记录与被试的特定行为相锁定。并且可以参考自然主义刺激加工研究领域已经较为成熟的被试间相关性(ISC, Inter-Subjects Correlation)分析(Nastase et al., 2019)和基于整体脑活动模式的多变量模式分析(MVPA, Multi-Variate Pattern Analysis)(e.g., Cichy

& Pantazis, 2017)来解读记录到的数据结果，结合机器学习的技术对相关神经数据集进行训练并用于解码(decoding)心理过程，将被试的相关神经过程和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对比，进一步完善模型。

其二，从具体研究设计落地上，确保被试在完成相应的阅读欣赏任务时都能够达到意象重构的创造性阅读目标也并非易事。可采取的思路是通过比较专家、熟手和新手在古诗阅读欣赏过程中的不同表现来揭示意象重构的创造性加工特点。或者根据前文所述古诗意象重构和想象的关系，将古诗意象的新颖程度和读者自身想象力这两个主要约束条件作为自变量进行操纵来考察相关过程。特别的，本文指出古诗意象重构和读者自传体记忆中的信息激活有关，那么也可以开发某种阅读策略或实验程序，例如情景设置启动或角色扮演，来干预读者的阅读欣赏过程，使之能够更容易达到创造性阅读的目标层次。

其三，在实践应用价值方面，研究者可以关注古诗阅读欣赏在创新教育与心理治疗方面的潜在益处。一方面，我国初中、高中语文新课标中，都有培养学生想象力、创新学习能力的要求，而古诗阅读欣赏过程中涉及到的认知、情感以及知情整合过程都是一种创新学习。学习者不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受到语言思维的训练，也能在感悟过程中陶冶其审美情感，更有利于其领悟古诗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关注古诗的创新教与学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能改变文学欣赏与语文创新学习有关理论落后于教学实践的窘境。另一方面，读者对古诗的审美再创造过程涉及到长时记忆中相关心理图式的更新，这可能有利于个体对创伤性记忆进行重构，也对个体自我概念的发展与自我统一性的建构有积极影响。结合相关艺术、叙事等心理治疗的技术，或许能发挥古诗阅读欣赏在心理健康领域的价值。

参考文献

陈庆荣 & 杨亦鸣. (2017). 古诗阅读的认知机制:来自眼动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 *3*, 48-76+205.

陈植锷. (1990). *诗歌意象论:微观诗史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贾丹丹. (2021). *古诗中意象词的心理加工过程及神经基础*.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

李卫君 & 杨玉芳. (2010). 绝句韵律边界的认知加工及其脑电效应. *心理学报*, *42*(11), 1021–1032.

李卫君 & 杨玉芳. (2016). 绝句中的韵律层级边界及其知觉研究. *中国语音学报*, *2*, 9–17.

屈光. (2002). 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论. *中国社会科学*, *3*, 162-171+208.

王运熙 & 周锋. (2012). *《文心雕龙》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叶朗. (2009). *美学原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俞平伯. (2013). *唐诗鉴赏辞典* (新一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袁行霈. (2009).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晶 & 陈燕. (2017). 诗从"悟"中来:中国古典诗歌顿悟过程的现代认知科学考察.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05*, 102–108.

张晶 & 刘昌. (2021). 古典诗歌鉴赏中诗句再认过程的脑活动：一项 ERPs 研究. *心理研究*, *14*(4), 297–304.

张晶, 刘昌, 沈汪兵, & 张小将. (2015). 诗句鉴赏过程中的顿悟:来自脑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 111–120.

赵娜, 马敏, & 辛自强. (2017). 生命意义感获取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心理科学进展*, *25*(06), 1003–1011.

朱光潜. (2012). *诗论*. 中华书局.

朱志荣. (2014). 论审美意象的创构. *学术月刊*, *46*(05), 110–117.

朱志荣. (2016). 论审美活动中的意象创构. *文艺理论研究*, *36*(02), 156–163.

Bein, O., Reggev, N., & Maril, A. (2020). Prior knowledge promotes hippocampal separation but cortical assimilation in the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1*(1), 4590.

Benedek, M., Beaty, R. E., Schacter, D. L., & Kenett, Y. N. (2023). The role of memory in creative ideation. *Nature Reviews Psychology*, 1–12.

Chen, Q., Beaty, R. E., & Qiu, J. (2020). Mapping the artistic brain: Common and distinct neural activations associated with musical, drawing, and literary creativity. *Human Brain Mapping*, *41*(12), 3403–3419.

Chen, Zhang, J., Xu, X., Scheepers, C., Yang, Y., & Tanenhaus, M. K. (2016). Prosodic expectations in silent reading: ERP evidence from rhyme scheme and semantic congruence in classic Chinese poems. *Cognition*, *154*, 11–21.

Cichy, R. M., & Pantazis, D. (2017). Multivariate pattern analysis of MEG and EEG：A

comparison of representational structure in time and space. *NeuroImage*, *158*, 441–454.

Conway, M. A., Justice, L. V., & D'Argembeau, A. (2019). The Self-Memory System Revisite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J. Mace (Ed.), *The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nway, M. A., & Pleydell-Pearce, C. W. (2000).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n the self-memory system. *Psychological Review*, *107*(2), 261–288.

Conway, M. A., Singer, J. A., & Tagini, A. (2004). The self an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Correspondence and coherence. *Social Cognition*, *22*(5), 491–529.

Hasson, U., Chen, J., & Honey, C. J. (2015). Hierarchical process memory: Memory a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9*(6), 304–313.

He, R., Zhuang, K., Liu, L., Ding, K., Wang, X., Fu, L., Qiu, J., & Chen, Q. (2022).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on poetry composition: An fMRI investigation. *Brain and Language*, *235*, 105202.

Heine, S. J., Proulx, T., & Vohs, K. D. (2006). The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On the Coherence of Social Motiv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2), 88–110.

Hetherington, P., & Atherton, C. (2017). Eyes inside words: Prose poetry, imagism, aesthetic empathy an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EXT*, *21*(Special 46), 1–20.

Holbrook, M. B., & Schindler, R. M. (1989). Some exploratory finding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al taste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6*(1), 119–124.

Johnson-Laird, P. N., & Oatley, K. (2022). How poetry evokes emotions. *Acta Psychologica*, *224*, 103506.

Kenett, Y. N., & Faust, M. (2019). A Semantic Network Cartography of the Creative Mind.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3*(4), 271–274.

Kumar, A. A. (2021). Semantic memory: A review of methods, models, and current challenges.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28*(1), 40–80.

Liu, S., Erkkinen, M. G., Healey, M. L., Xu, Y., Swett, K. E., Chow, H. M., & Braun, A. R. (2015). Brain activity and connectivity during poetry composition: Toward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Human Brain Mapping*, *36*(9), 3351–3372.

Liu, Z., Grady, C., & Moscovitch, M. (2017). Effects of Prior-Knowledge on Brain Activation and Connectivity During Associative Memory Encoding. *Cerebral Cortex (New York, N.Y.: 1991)*, *27*(3), 1991–2009.

Loveday, C., Woy, A., & Conway, M. A. (2020). The self-defining period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Evidence from a long-running radio show.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8.

Madore, K. P., Addis, D. R., & Schacter, D. L. (2015). Creativity and Memory: Effects of an

Episodic-Specificity Induction on Divergent Think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9), 1461–1468.

Nastase, S. A., Gazzola, V., Hasson, U., & Keysers, C. (2019). Measuring shared responses across subjects using intersubject correlatio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4*(6), 667–685.

Ovando-Tellez, M., Benedek, M., Kenett, Y. N., Hills, T., Bouanane, S., Bernard, M., Belo, J., Bieth, T., & Volle, E. (2022).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gnitive and neural correlates of semantic memory search related to creative ability. *Communications Biology*, *5*(1), 604.

Ovando-Tellez, M., Kenett, Y. N., Benedek, M., Bernard, M., Belo, J., Beranger, B., Bieth, T., & Volle, E. (2022). Brain connectivity–based prediction of real-life creativity is mediated by semantic memory structure. *Science Advances*, *8*(5), eabl4294.

Sheng, J., Wang, S., Zhang, L., Liu, C., Shi, L., Zhou, Y., Hu, H., Chen, C., & Xue, G. (2023). Intersubject similarity in neural representations underlies shared episodic memory cont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20(35), e2308951120.

Teng, X., Ma, M., Yang, J., Blohm, S., Cai, Q., & Tian, X. (2020). Constrained Structure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Facilitates Speech Content Grouping. *Current Biology: CB*, *30*(7), 1299-1305.e7.

Thakral, P. P., Madore, K. P., Kalinowski, S. E., & Schacter, D. L. (2020). Modulation of hippocampal brain networks produces changes in episodic simulation and divergent think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7*(23), 12729–12740.

Tinio, P. P. L. (2013). From artistic creation to aesthetic reception: The mirror model of art.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7*, 265–275.

Tulving, E. (2002). Episodic memory: From mind to brai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1), 1–25.

Vartanian, O. (2014). Empirical aesthetics: Hindsightand foresight. In J. K. Smith & P. P. L. Tinio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and the Arts* (pp. 6–3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essel, E. A., Pasqualette, L., Uran, C., Koldehoff, S., Bignardi, G., & Vinck, M. (2023). Self-Relevance Predicts the Aesthetic Appeal of Real and Synthetic Artworks Generated via Neural Style Transf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7.

Wassiliwizky, E., Koelsch, S., Wagner, V., Jacobsen, T., & Menninghaus, W. (2017). The emotional power of poetry: Neural circuitry, psychophysiology and compositional principle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2*(8), 1229–1240.

Wittrock, M. C. (1992). Generative learning processes of the brain.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7*(4), 531–541.

Xue, G. (2018). The Neural Representations Underlying Human Episodic Memor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2*(6), 544–561.

Xue, G. (2022). From remembering to reconstruction: The transformative neural representation of episodic memory. *Progress in Neurobiology*, *219*, 1–15.

Yeshurun, Y., Nguyen, M., & Hasson, U. (2021).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Where the idiosyncratic self meets the shared social world.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2*(3), 181–192.